

DOI: 10.13288/j.11-2166/r.2018.05.003

清代医家从业原因考察

丁立维, 张其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清代废除了明代的世医制度, 使得医家的出身背景多样化, 通过对医家从业原因的考察可以了解其出身背景 and 知识体系, 为进一步理解医家的学术思想起到辅助作用。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与总结, 认为清代医家的从业原因可概括为科举失利, 弃举习医; 遭逢变故, 转而学医; 儒官兼医, 治国利民; 家学渊源, 世代为医四个方面。除了最后一项是传统的医学传承模式外, 其他三项都可以理解为儒生的半路出家, 并分析了这些从业原因对医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清代医家; 从业原因; 知识背景

“留神医药”出自张仲景《伤寒论·序》, 曰“怪乎当今居世之士, 曾不留神医药, 精究方术, 上以疗君亲之疾, 下以救贫贱之厄, 中以保身长全, 以养其身”^[1]。这本是张仲景对于当时之人汲汲于名利而不在意性命的批判, 然而自宋代以后, 由于文化产业的繁荣, 书籍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 有条件有兴趣“留神医药”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尤以清代为最。在古代, 出身对于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明代沿袭了元代分定职业和地位的有关规定, 制订了一套更为严格的行户世袭制度。另外, 明代太医院的医学生一般也从医户子弟中选拔^[2]。清代则废除了明代的世医制度, 对个体医生队伍的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尽管清代社会对医生的重视程度不高, 政府的关注点主要在宫廷医疗系统的建构与完善, 清政府既没有对民间医疗进行过多的鼓励, 也没有对其发展设立门槛, 加以干预^[3]。因此, 清代医家的出身背景多种多样, 思想也各有异趣, 所以对清代医家从业原因的考察有助于厘清医家的出身背景以及对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本文以正史列传、文人笔记、作品序言等为研究材料, 试图考察清代医家的从业原因, 以助于今后对其学术思想的梳理和研究。

1 科举失利, 弃举习医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是中国传统社会对读书出仕的普遍认识, 只有通过读书之后考取功名才能为官以施展抱负。然而一面是应试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导致录取比例的降低, 一面是日益僵化的考试内容引起士子们的厌倦。宋人笔记中记录的“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之言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另外一条治世之道, 这句话鼓励了无数儒家学子投入了医学事业之中, 形成了一股“儒医”的风潮。

1.1 屡试不中, 弃儒业医

科举作为明清读书人唯一正规的出仕途径, 竞争十分激烈。与明代一样, 清代的科举考试也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其中童试又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 通过了院试的士子才被称为生员, 也叫秀才。获得了秀才的资格后才能参加接下来的考试。通过乡试者称举人, 通过会试者称贡士, 最后才能参加殿试。殿试结果按成绩高低分为三甲, 一甲取前三名, 二甲三甲分别有数名。除了一甲以外的进士还要参加朝考, 综合以往成绩, 才能被任命官职^[4]。可见清代读书人想要通过正规途径做官是很不容易的, 因此, 有许多儒生在屡试不中之后选择了弃儒业医, 如陈士铎、王子接、吴仪洛、沈金鳌、余霖等。

清代嘉庆年间《山阴县志》记载“陈士铎, 邑诸生, 治病多奇中, 医药不受人谢, 年八十卒。”^[5]可见陈士铎的科举之路止于诸生。而魏荔彤在为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作序时提到: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234)

* 通讯作者: zhangqicheng96@163.com, (010) 64286362

“东吴王子晋三，以通儒而深研医理，挟术以游，全活不可数计。盖从事于斯者垂五十年，深思力学，得之有素，于仲景之书，如探珠赤水，独得颌下一颗”^[1]，可见王子接亦未为官。吴仪洛在其《本草从新》自序中言“余自髫年习制举业时即旁览及焉。遇有会意，辄觉神情开涤，于是尽发所藏而精绎之，迄今四十年矣。”^[2]表明他曾习制举业。沈金鳌的兄长在《杂病源流犀烛》的序中写到“余弟芊绿，博古明经，一生笃学，大约四十以前专志儒书，四十以后专攻医学，故著作甚富，于儒则有芊绿草堂稿若干种，于医则有《沈氏尊生书》若干种”^[3]。正史中并无沈金鳌为官的记录，因此，可判断沈金鳌很有可能是由于前四十年屡试不中而弃儒业医的。蔡曾源在为余霖《疫疹一得》作的序里写道“桐城余师愚先生，与予同客都下，订忘年之交。历二十余年，今年且将七十矣，得摄生之术，貌古而神腴，少年奋志读书，有不可一世之概，而屡蹶名场，乃喟然曰：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古人其诏我哉！遂弃举子业，专务岐黄”^[4]，可见余师愚亦是因屡蹶名场而弃举从医的。

1.2 八股桎梏，无意功名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去考取功名，明清时期科举以八股文作为录取标准，八股文由破题到完篇，在篇法、股法、字数、结构、句法、句数、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这一文体极大地束缚了士子们的创造能力。清乾隆九年（1744 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便从八股文内容空洞、考生抄袭敷衍、出题浅薄不实以及学术无所发明等四项弊端上疏主张废除科举^[5]。虽然这次主张并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的支持，但舒赫德这种对于科举的看法无疑也代表着读书人的心声，其中因无意功名转而学医的医家有徐大椿、赵学敏、汪昂、潘楫等。

徐大椿，字灵胎，江苏吴江人，《清史稿》载其“为诸生，勿屑，去而穷经，探研易理，好读黄老与阴符家言。凡星经、地志、九宫、音律、技击、句卒、羸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于医，世多传其异迹”^[6] 1590。赵学敏则在其《本草纲目拾遗》中提到“先君尝以一子业儒，一子业医，……贮甲乙卷于养素园，区地一畦为栽药圃，予弟兄春秋辄寝食其中，……予自愧谫庸，号涔勺水，曾当大雅之目者，乃欲为瓦釜鸣耶。忆自髫龄性好博览，凡星历医卜方技诸学，间亦涉历之，意有所得，即欣欣忘倦”^[7]，表明自己对科考以外的诸多学问更

感兴趣。汪昂的学弟陈丰在为《本草备要》作的序中道“汪子庵，予之至交也。少长宫墙，逾壮厌薄制举，遂自逸以老，然经史百家靡不殚究，而于岐黄之书为尤嗜，盖以刀圭家鲜能探注，而养生者又不可以不知也。”^[8] 正因为他们这种博学好奇的求知态度，才使得他们在医学领域有了独特的见解。

2 遭逢变故，转而学医

这部分医家与上述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外界或自身条件的改变放弃了原定道路，转而投身于医学领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读书经历都或多或少与身体条件和家境有关。此节所述的医家便是多由于此二者的缘故转而学医。

2.1 家国情深，抗清不仕

明清之交，社会动乱不安，华夏仁人志士既无法挽救腐朽至极的明王朝，又不愿屈服于异族统治之下，在清朝前期，便涌现了许多弃文从医、隐居不仕的医家，如喻昌、柯琴、姚止庵、张璐、高斗魁等。

喻昌，江西新建人，幼年时即能作文，性格豪放不羁。在明崇祯年间以副榜贡生入京上书言事，未得重用。清顺治年间，曾落发为僧，后又蓄发在江南行医^[9] 1588-1589。喻昌的《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三书中均有一定的易学内容，这与他的贡士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张璐也是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之一，明清动乱之际，他在洞庭山隐居了 10 余年，弃儒业医，写书以自娱，到老也不觉得疲倦^[10] 1589。张璐的本草类著作《本经逢源》与综合类著作《张氏医通》中均有涉及易学的内容。高斗魁，号鼓峰，是浙江鄞县人。《清史稿》记为“诸生”，他的兄长高斗枢在反清斗争中丧生，斗魁有侠义之气，对于明朝遗民遭逢苦难之人往往以自家财产施救”^[11] 1589。

2.2 自救救人，以医卫生

因为家人患病而发奋学医的医家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如张仲景便是其族人因伤寒而亡者十居其七，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12] 13，写成了《伤寒杂病论》。清代乾嘉时期的温病大家吴瑭亦是一例。吴瑭在《温病条辨》自序中提到了自己的学医经历，他的父亲在他十九岁时因为“病年余，至于不起”。他“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苦块之余，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13]。

除了由于家人患病哀痛愧疚转而学医者之外,还有因为自身体弱或患病而留心医药者,如洪缉庵、章楠、吴坤安、黄元御、钱峻等。洪缉庵是清代乾隆时期医家,他在《虚损启微》自序中说“寝瘵也久,倦于文史方书,于虚损一症,尤加体会,自救也因以救人,肱盖三折矣”。在他的朋友为之作的序中也有“余友洪君缉庵,病弃举业,潜心医学”的论述^[13]。可见洪缉庵是久病而成良医。章楠在其《医门棒喝(初集)》自序中也说“幼得羸疾”^[14]。吴坤安亦是体弱多病,转而从医^[15]。钱峻的经历与上述医家有异,他因父亲中年离世,过于悲痛,“急患失血,几危,逾年稍愈”,母亲便对他说“汝犯此症,功名之念已矣。吾见汝自幼好辑方书,不如留意岐黄,一可以养生,一可以济世,庶不负先人好善之嘱也。”^[16]钱峻遂志于医。黄元御的经历也令人唏嘘,他本为诸生,因庸医误治而损伤了双目,于是发愤学医,终成一代大家^[17]。值得一提的还有陈复正,他在《幼幼集成》序中提到自己“幼稟亏多病,于医家色脉之要顿,尝究心长际仙师授金鼎火符性命之秘,嗣是遨游海岳,冀遇同俦,竹杖芒鞋,行方几半”^[18]。陈复正是罗浮山上的道士,是本文所列医家中唯一一位道士出身的人。

2.3 家贫无依,业医谋生

在古代,若家贫不足以自给,是无法一心一意投入举业的,而通过科举考试为官改善家境的毕竟是少数,且不说清代官员的俸禄如何,单论参加科考的成本便足以使一个贫困的家庭退却了。为医既可济世利民,又可得些钱财养家糊口,故而成为许多寒门士子的选择,如陈岐、邹澍、冯兆张等。

陈岐在《医学传灯》中言自己幼年丧父,又遭遇水灾,无法沉下心来投入举业,如果虚度一生,便无颜告慰列祖列宗,因此选择以医为业,曰“固为温饱之计,而删述纂修之功,固当亦有责焉”^[19]。表明其虽然业医谋生,但也想通过自己对于医学的整理和总结为社会做贡献,这是传统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清史稿》载邹澍“家贫绩学,隐于医。道光初,诏举山林隐逸,乡人议以澍名上,固辞”。邹澍虽以家贫隐于医,但对于知识的追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澍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势沿革,诗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襮”^[20]。冯兆张在《冯氏锦囊秘录》自序中也提到了自己的从医始末,曰“但张七龄,先严见背,痛乏趋庭之训;长因贫窶,苦无膳读之

资,虽由诸生以入国学,实以岐黄之道牛马四方”^[21]。这些由家境贫弱不足以支撑其举业的士子转入医学行业后,并没有因此而沦为市井之医,而是保留了士人所引以为豪的责任感与道德心,并且在责任感与道德心的引导之下,为医学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3 为儒为官,治国利民

传统医学作为性命之学,身心所寄,将许多对性命、身体、宇宙有兴趣的学者注意力吸引到了传统医学之中。因此,在清代早中期涉易医家中也有官吏和名儒的身影,如景日昡、马齐、阎纯玺、何梦瑶、徐文弼、陈修园、杨时泰、罗国纲等。

《嵩崖尊生书》的作者景日昡是康熙辛未进士,官至户部侍郎^[22]。马齐在《陆地仙经》序中的落款为“赐进士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总理事务二等伯加五级”^[23]。《清史稿》载何梦瑶“与同里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吴秋一时并起,有‘惠门八子’之目。雍正八年成进士,出宰粤西,治狱明慎,终奉天辽阳知州”^[24]。徐文弼《寿世传真》自序的落款为“乾隆三十有六年辛卯岁嘉平月钦赐国子监司业香山老人年家旧寅弟王世芳拜撰时年一百一十三岁”^[25]。陈修园则“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种,并行世”^[26]。《本草述钩元》记载“杨时泰,字穆如,嘉庆己卯举人,工医事,……署山东莘县知县卒”^[27]。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自序中的落款为“时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岁孟冬月,敕封承德郎翰林院检讨加三级楚南上湘罗国纲振占氏自序”^[28]。上述诸位皆是身为官吏而留心医药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清代还涌现了许多于文章之外兼擅岐黄的名儒,如罗美、程林、蒋介繁、严西亭、林佩琴、曹庭栋、程鹏程、吴金寿等。赵汝揆在为罗美《内经博议》所作的题辞中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求所谓卓然自命,上不溷君王而下不委诸草莽者,其在岐黄之业乎,……犹忆总角时,郡中得交罗君淡生即今之东逸也,探所得细绎,胸中经史衮衮可听,旁及古文本学皆可法,知其非常人”^[29]。又有严西亭同乡魏朝阳为其作序言“我姚严西亭、施澹宁、洪缉庵三先生者,文章之外,兼擅岐黄”^[30]。吴金寿更是“博学好古,诗善六法,兼通

医理,为吴郡张容庭入室弟子”^[24]。这些名儒对于医学的关注同样是出于济世利民和个人兴趣,观其著作,多为理论综述、汇编之类,当然也不乏《急救广生集》这种切合实际的著作。

4 家学渊源,世代为医

这一部分的医家纯粹以医立命,其中包括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太医院的御医们,如祁坤、尤乘、吴谦、黄宫绣等。祁坤在《外科大成》自序中写到:“家世业儒。舞象时即肄力于八股之间。学未窥斑而严君见背”,在其老师戴望之的引导下,“奋志攻苦,一切桐君之所秘,雷公之所传,琼函宝笈,靡不搜采”,最终走向了大医之道^[25]。尤乘是李中梓门人,清康熙年间曾出任太医院御前侍直三年。黄宫绣曾于清乾隆年间任宫廷御医。《清史稿》载吴谦“官太医院判,供奉内廷,屡被恩赉,清乾隆中,敕编医书,太医院使钱斗保请发内府藏书,并徵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传经验良方,分门聚类,删其驳杂,采其精粹,发其余蕴,补其未备,为书二部”^{[11] 1590}。他主持编纂的《医宗金鉴》成为了清宫太医院医学生的教材。

御医毕竟与普通百姓生活相去甚远,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活跃在民间的医家,如张志聪、张倬、李用粹、高士宗、钱潢、叶天士、陶承熹、丁锦、滕万卿、陈复正、汪文绮、顾世澄、魏之琇、吴坤安、顾锡、李学川、曹存心、王秉衡、王孟英等。这些医家多是世代为医,如张倬是清代著名医家张璐之子,钱潢也是“以医世其家”^[11],叶天士的祖上和父亲“皆精医”^{[11] 1590},汪文绮“家世业岐黄”^[22],顾世澄是“鸿江儒士,三世业医”^[23]等。传统医家是医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与儒士不同,儒士编纂的医书更倾向于理论挖掘与方药汇集,而传统医家书写的医书则更偏向于临床医案的记录与医疗经验的总结,这两者都是医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5 小结

正如谢观所言“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为术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常”^[24]。除了历代政府通过医学教育的引导对医家的整体研究方向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外,自宋以来,大批儒士加入医家队伍同样对医学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上文提到的多位医家的出身及经历各有不同,观其比例,有儒学背景的医家无疑占大多数。他们或因政治因素不愿出仕,或因

屡试不中失去耐心,或因八股无趣无意功名,或因病痛折磨久成良医,或因家境贫寒业医谋生,如此种种原因使他们加入了医者的队伍,同时也带来了儒家的道德要求、理论思辨以及济世利民的高远志趣。古代传统医家本更偏向于道家黄老之学,在加入了儒学血液之后,在原本清静无为、恬淡寡欲的人生态度中又注入了新的“修齐治平”的人生意欲,正如罗国纲在其《罗氏会约医镜》自序中所言“诚以良相辅翼圣君,燮变理阴阳,俾群生咸安化宇;良医挽回造化,拯救困危,俾个疾悉登寿域”,这正是自宋以来儒家对医家的普遍认识。

因本文所举医家的医著中大多含有易学内容,所以在此探讨一些关于医易会通的问题。景日珍在《嵩崖尊生书》中提到,“余自卯角时治《周易》,稍长,以先孺人寝疾,从事岐黄之学。又数年读《难经本义》,已而读《内经》《灵枢》《素问》诸篇,恍然于医易之同源也。今夫天地间不过此阴阳动静之理,消长变化之机,在天地与人身原无二致”。这大概是有易学基础的人接触中医的共同感受。因此,良好的易学基础是医家运用易学语言阐述医理的前提。他们选择用易学语言作为医学的说理工具有两个原因:1) 易学是沟通医学和儒学思想的桥梁,“易以道阴阳”,在儒生所学的课程中,只有易学涉及到了传统技术类的内容,也只有易学含有与医学近似的语言体系,在转行时将不熟悉的论理方法转化为比较熟悉的说法能够让相关概念被更好地理解与接受;2) 将易学语言引入医学,不仅能更深入和准确地阐述医理,还能将传统医学赋予更多人文哲学的内涵,使得由于种种原因将人生志趣转向医学,他们会对医生产生更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传统医学也成功地超越了其他的技艺,成为了公认的仁术^[25]。

参考文献

- [1] 张仲景. 伤寒论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13.
- [2] 梁峻. 中国中医考试史论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4: 36.
- [3] 张磊. 清代北京中医医疗模式研究 [D]. 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0.
- [4] 徐彩霞. 清代科举制度对士子学风的影响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 [5] 陈士铎. 陈士铎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1137.
- [6] 王子接. 绛雪园古方选注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 1.

- [7] 吴仪洛. 本草从新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自序.
- [8] 沈金鳌. 沈金鳌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25.
- [9] 余霖. 疫疹一得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6: 8.
- [10] 张杰. 清代科举制度与传统政治文化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4(3): 69-72.
- [11] 赵尔巽. 清史稿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2]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460.
- [13] 汪昂. 本草备要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1.
- [14] 吴塘. 温病条辨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1.
- [15] 洪缙庵. 虚损后微 [M] // 治虚六书. 李成文, 刘桂荣, 主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134-135.
- [16] 章楠. 医门棒喝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134-135.
- [17] 吴坤安. 伤寒指掌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1.
- [18] 钱峻. 经验丹方汇编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8: 1.
- [19] 陈复正. 幼幼集成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8.
- [20] 陈德求. 医学传灯 [M] // 裘吉生. 珍本医书集成.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2.
- [21] 冯兆张. 冯氏锦囊秘录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7-8.
- [22] 景日珍. 嵩崖尊生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
- [23] 马齐. 陆地仙经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8: 65.
- [24] 徐文弼. 寿世传真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 2.
- [25] 杨时泰. 本草述钩元 [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3.
- [26] 罗国纲. 罗氏会约医镜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2.
- [27] 罗美. 内经博议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1-2.
- [28] 严西亭. 得配本草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8: 2.
- [29] 吴金寿. 三家医案合刻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7.
- [30] 祁坤. 外科大成 [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7: 2.
- [31] 钱潢. 伤寒溯源集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2-6.
- [32] 汪文绮. 杂症会心录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 自序.
- [33] 顾世澄. 疡医大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5.
- [34] 谢观. 中国医学源流论 [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46.
- [35] 余新忠. “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 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4): 120-131.

Employment Reasons in Physicians of the Qing Dynasty

DING Liwei, ZHANG Qicheng

(School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Hereditary medic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abo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diversified the background of a physician. The background and knowledge system of physicians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employment, which plays an auxiliary role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thought of physicians. By summarizing the literature, the authors think that the causes of employment in physicians of the Qing Dynasty include 4 aspects: imperial examination failure and abandoning the exam for medicine, encountering changes and turning to medicine, being confucian officials and physicians to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benefit the people, as well as influenced by a scholarly family and being physicians for generations. The last aspect is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inheritance mode; the other three aspects can be understood as confucians switching to a new profession.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reason on medicine development.

Keywords physician of the Qing Dynasty; cause of employment; knowledge background

(收稿日期: 2017-11-07; 修回日期: 2017-12-20)

编辑: 黄 健